



青年毛泽东的一次『游学』经历

□ 常馨月

青年时代，毛泽东就立下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古代学者推崇的求知方式，青年毛泽东亦是如此，但是他有更高的追求和抱负，把改造社会作为目的。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期间，为了深入了解社会、增长见识、探寻改造社会的方法，毛泽东有过几次“游学”经历。其中，1917年暑假的一次游学活动历时最久、行程最远、效果甚大。

1911年，毛泽东从湘潭县前往省城求学。1913年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14年并入湖南第一师范）。当时，湖南第一师范注重人格和学识的培养，以人格教育、国民教育、实用教育为理念吸引了大批有志青年前来求学。学校还提出：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势，察社会之情状。毛泽东深受这些进步观念的影响，他同蔡和森、何叔衡、罗学瓚等人结为朋友，纵论国事、探求真理。虽然勤学苦读，但毛泽东认为读书和看报毕竟都停留在“知”的层面上，光有这些远远不够。一个人只有致力于现实，做到知行合一，才能对社会有更为透彻的认识，才能找出改造社会的正确道路和方法。他常对同学讲，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毛泽东在他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对于游历求学的作用，毛泽东认为，“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湖失；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引发1917年暑假这次“游学”的直接动因则是一份报纸的报道。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有一天我读到一份《民报》，上面刊载两个中国学生旅行全国的故事，他们一直走到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所以我想应当先在湖南旅行一试。”7月中旬，毛泽东与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同行，开启了这次行程。他们

仅带着换洗的衣服、一把旧雨伞、笔记本、毛笔和墨盒等简单用品就出发了。

历时一个月，他们步行漫游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个县，行程900余里。这次“游学”，未带一文钱。一路接触城乡社会各阶层的人，了解一些风土民情，获得了许多新鲜知识。最后由于沅江涨水，部分民房和道路被淹，行程被迫中断，8月16日，他们回到了长沙城。

山河游历开阔了眼界胸襟。游历的5个县多位于湘中或湘东北地区，地貌多为山地、丘岗和平原地带。如安化处于雪峰山的主干带，境内群山起伏，谷岭相间，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100多座；而益阳位于洞庭湖南岸，其南半部是丘陵山区，北半部是洞庭湖淤积平原，一派水乡景色。长途跋涉中，一会儿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一会儿是美丽多姿的山峦，一会儿是弭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的乡间美景。除了自然风光的秀美，5个县的历史也很悠久，长沙、益阳等皆于公元前221年秦灭楚之际，便设立郡县。游览祖国的山川美景，探访历史古迹，让毛泽东陶冶了情操，也开阔了眼界胸襟。

接触民众深入了解了社会。一路上，毛泽东走访了众多学士名流、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地方官吏等社会各界人士，查阅各县县志了解了风土人情和社会状况。在所有接触的人群中，毛泽东尤其注重接近农民，每到一地方都主动跟农民聊家常，还帮他们干农活。农民看到毛泽东说的都是农家话，讲的都是农家事，又同情关心他们的疾苦，感觉非常亲切，都愿意和他交谈，留他们吃饭住宿。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在聊天交流中，农民们纷纷诉说自己长年辛苦劳作，却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的苦难经历，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深深的触动。在同各阶层人物打交道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积累了应对社会事务的初步经验和能力。

艰苦行程磨炼了意志品质。“游学”不带分文，面临各种困难，但毛泽东知难而进、迎难而上，以此磨炼自己的意志。他们每到一处，遇上学校、商店或住户，就写一副对联送去，接受一点馈赠，但这些馈赠并没有保障，所以经常忍饥挨饿。还要对抗恶劣的天气，湖南的夏天非常炎热，常伴有暴雨。一天，他们在宁乡县遭遇暴雨，随身带的伞散架了，两人浑身湿透，连买把新伞的钱都没有。如果行到中途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找不到农家或旅店投宿，就得露宿野外。去安化途中，由于天色已晚，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只好露宿河堤。此行，毛泽东还拜访了好友何叔衡，何家热情招待，并给予了资助，毛泽东坚决拒绝。此后，为了确保“游学”的初衷，避免此类“资助”，便又减少了拜访友人。

这次“游学”经历加深了毛泽东对湖南省情、风土人情的了解，特别是对湖南农民实际生活的了解，也使他対改造社会探究“大本大源”形成一定的思考。回校后不久，8月23日，毛泽东便给北京的黎锦熙写了封信，信中提到了暑假的经历，谈了自己对“天下国家之大计”的看法：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的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在显见之后。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此后，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又开展了几次“游学”。

青年毛泽东的“游学”，不是传统社会文人的游历求学、结交师友，而是以改造社会为目的，带有强烈的责任感，深入民间，了解社会。这也为他日后思想的成熟奠定了一定基础。今天，回顾毛泽东的这段经历依旧对我们有着重要启示。当代青年要学习他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怀，学习他躬身力行、以人民为师的实践精神，学习他在社会调研中不断开阔胸襟、增长本领的方法，在新时代新征程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中共豫皖苏边区建国学院的干教历程

□ 方 伟

在安徽省界首市颍南街道办事处颍河岸边，有一处不起眼的砖瓦平房，斑驳的墙壁刻满了岁月的痕迹。墙上挂着一块写有“中共豫皖苏边区建国学院旧址”的牌匾。解放战争时期，豫皖苏边区党委、行署创建的豫皖苏边区建国学院（以下简称建院）曾在此地办学。这所革命干部学校以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和建设新中国培育人才为宗旨，在一年多的办学历程中，先后培养出近3000名干部，为革命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豫皖苏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彭雪枫、吴芝圃、张爱萍等领导人民创建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战争开始后，1946年12月，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了豫皖苏边区党委、豫皖苏行政公署和豫皖苏军区。1947年下半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沉重打击和消灭了国民党军队及反动势力，豫皖苏边区得以不断巩固和扩大。为适应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需要，1947年年底，豫皖苏边区党委、行署在驻地河南省鄆陵县创办豫皖苏边区建国学院。当时敌我斗争比较激烈，建院院址不固定，师生随着边区党政领导机关转移，边行军边办学。1948年7月，建院随豫皖苏分局（区党委已改为分局）、行署迁驻界首办学，以颍河南岸的玉皇庙为院部，即现在的旧址所在地。当时的界首经济文化较为发达，成为豫皖苏边区的中心地区。建院通过张贴广告、发动在院学生动员家乡青年入院学习等方式扩大招生规模。同时不断有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青年，因向往光明而投奔解放区，经行署和各分区介绍入院学习。1948年11月，豫皖苏分局决定，建院迁往河南省开封市办学。除接收河南大学等校部分学生外，建院还派人分赴郑州、商丘、徐州等地招生，招生规模最大时达



位于安徽省界首市的中共豫皖苏边区建国学院院部旧址

到在校生1500多人。

办学初期，建院工作人员很少，条件极为简陋。迁到界首后，组织机构基本健全，教学工作开始走上正规化。豫皖苏分局和行署陆续调配人员到建院工作，同时选拔部分学员参加院内工作，充实建院管理机构。院长任崇高是著名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当时他已60多岁，被尊称为任老。副院长纵翰民，参加过广州起义，具有丰富的革命经历，他谦虚谨慎、任劳任怨，深得全院师生的爱戴。迁到开封后，建院设有院部、系部、预科部；设立财经、农学、教育、文史、新闻等系，聘请河南及开封教育界多位知名人士来校任教；开设会计人员速成班；另附设公教人员讲习班，吸收改造国民党政府的旧职人员。建院制定《组织简章》规范教职员工的职责，确立了院务会议、教导会议等制度；建院设有党支部，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保证工作计划实施以及团结教育学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教学方面，建院坚持以政治理论学习为主要内容，始终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

方针，并将多种教学方式融入教学安排。一是进行课堂讲授。时任豫皖苏分局书记宋任穷、行署主任吴芝圃以上大课的方式为学员作《怎样认识目前形势》《新时代与新人物》等报告。边区其他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也经常来建院作专题报告。二是组织自学并开展讨论。组织学生自学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以及解放区有关土改、政法、财经等方针政策。要求学员在认真学习思考的基础上，分班、组围绕主题进行讨论，学员畅所欲言，气氛热烈。对学员提出的问题由院领导或教师予以讲解。三是开展社会实践。鼓励学生组成宣传队、秧歌队，编排节目演出，向群众宣传革命形势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组织学员访贫问苦，参加群众斗争大会，帮助群众生产生活。还组织学员参加绘制军用地图、征集粮草等工作，在实际斗争中增长才干、提高觉悟。豫皖苏边区《雪枫报》曾报道：“边区建国学院经三天一个早晨帮助群众割麦101亩，同学们情绪非常高涨，在麦地里争先恐

辛弃疾的地方治理之道

□ 钟恢万

南宋将领辛弃疾，一生力主抗金收复北方失地，在军事上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将才。同时他又写得一手好词，有“词中之龙”之称，作为豪放派的代表与苏轼合称“苏辛”，清代文学评论家陈世倌称赞辛弃疾“真词坛飞将军也！”除此之外，辛弃疾还是一位地方治理“能手”，他一生先后在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福建、浙江等地为官，每到一处任职，辛弃疾皆恪尽职守，大力除弊革新，造福一方百姓，理学家朱熹对其地方治理的政绩赞不绝口，称“这便见得他有才”。

临民以宽，既济民又利民

1172年，辛弃疾任安徽滁州（今安徽省滁州市）知州，这是他首次出任地方行政长官，担负治理一方的重任。滁州地处宋金边界，百姓饱受战乱蹂躏之苦，南宋文人崔敦礼在《代严子文滁州奠枕楼记》中记载了当时滁州景象：“周视郭郭，荡然成墟，其民编茅簷茅，侨寄于瓦砾之场，庐宿不修，行者露盖，市无鸡豚，晨夕之须无得。”面对满目疮痍、民穷财尽的惨状，辛弃疾心急如焚，到任后推行了“宽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议屯田”等一系列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的举措。他写了一封奏折《谢免上供钱启》，上疏朝廷请求对滁州以边境之郡对待，免去历年所欠朝廷的赋税，得到了朝廷批准，此举大大减轻了当地百姓负担。辛弃疾又为恢复贸易往来减免商贩营业税额的十分之七，商贩们闻风而动，促进了贸易往来。为了恢复农耕，辛弃疾发布招抚令，把流落他乡的百姓召回，鼓励他们从事耕作；对流亡

到滁州的外乡百姓分给无主荒地耕种，由官府借贷给其中缺少耕畜、农具、粮种的人，鼓励他们安家落户。同时，辛弃疾组织百姓砍伐木材、烧制砖瓦，在街道两旁修建了大量商铺、邸店，为商贩提供便利条件，并兴建了一处集市“繁雄馆”。在一系列济民又利民举措的驱动之下，半年多时间滁州迅速恢复生机，当年夏粮大丰收，百姓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人口逐渐增多。正如《代严子文滁州奠枕楼记》一文中所描述的“面城邑之清明，俯观阊之繁夥，荒陋之气一洗而空”，一个政通人和的新滁州呈现在世人面前。

1180年，辛弃疾“差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第二次调任隆兴府（今江西省南昌市）。据《宋史·辛弃疾传》记载：“时江右大饥，诏任荒赈政。”当时江西正遭遇严重饥荒，一些商贩借此囤粮致粮价飞涨，百姓苦不堪言，有的民众不惜铤而走险抢掠粮食，动乱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辛弃疾临危受命，果断采取一系列赈灾济民的举措。一方面严禁商販只囤粮不卖粮，“闭余者配”，对囤积者一律流放；另一方面严防哄抢粮食，“强余者斩”，对抢粮者一律斩首。在辛弃疾得力举措之下，当地形势趋于平稳。随后，他召集官吏、儒生、商贾、市民等推选出一批能干又可靠的人，把隆兴府库中的官钱、银器分别借支给这些人作为本钱，限定他们在一月之内从外地购买粮食并运回隆兴府销售，等卖完粮食之后再把之前的借款本金偿还给官府，官府不收取利息，于是大批运粮船只接踵而来，隆兴府的粮食得到了保障，辛弃疾在一个月內迅速接济了百姓，解决了饥荒。彼时，毗邻的信州（今江西省上饶市）也处于饥

荒之中，信州知州谢源明向辛弃疾紧急求援，当时辛弃疾的幕僚反对救助，但辛弃疾却说：“均为赤子，皆王民也。”他以赈灾济民的大局为重，立即把十分之三的运粮船发往信州，解了信州百姓燃眉之急。辛弃疾雷厉风行赈灾济民之举，得到了宋孝宗褒奖，也成为历代救灾典范。

戡乱弭盗，既治标又治本

1175年，因朝廷茶叶专卖弊政引发了以湖北茶商赖文政为首领的茶商军起义，茶商军起义席卷湖北、江西、湖南、广东等地，南宋朝廷先后派出多批官军前往征剿，但几乎都招致兵败。这年仲夏，宋孝宗重新起用辛弃疾，任命他为江南西路提点刑狱，令他“节制诸军，讨捕茶寇”，驻节于江西贛州。辛弃疾到任之后，检视之前官军征剿茶商军失利的教训，采取淘汰老弱残兵、机动灵活作战、以逸待劳等多种策略，不到3个月时间就平定了动乱，受到宋孝宗嘉奖。此后，他多次被朝廷委以弭盗安民的重任。1177年，辛弃疾“知江陵府兼湖北路安抚使”，当时湖北境内盗贼猖獗、治安混乱，辛弃疾采取治乱用重典的策略，严厉惩治盗贼，以至“奸盗屏迹”，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在江西、湖北、湖南任上，辛弃疾多次戡乱弭盗，守护了一方平安，而且他不止于治标之效，还深思这些动乱爆发的根源。辛弃疾在写给宋孝宗的奏折《淳熙己亥论盗贼札子》中深入分析了为什么“比年李金、赖文政、陈子明、陈峒相继窃发，皆能一呼啸聚千百，杀掠吏民”，根源就在于“田野之民，郡

后谁也不甘落后一步。”

建院继承发扬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校训。学员虽然来自不同地方，文化水平存在差异，但是彼此之间团结和谐，互敬互助。建院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学员经常进行群众纪律教育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净化了校风学风。教职工与学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建院在战争环境中办学，条件非常艰苦。学员们睡的是地铺，吃的是粗粮，穿的是粗布衣，却没有人叫苦抱怨。听课学习没有桌凳，学员席地而坐，笔记本置于膝盖上做记录。在开封办学时，一次国民党飞机来袭扫射，造成一人牺牲、多人负伤的惨痛损失。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学员们接受了集体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砥砺了意志品质、增强了斗争精神、升华了思想境界。建院培养的学员毕业后分布在全国10多个省区市，有的担任省市部门的重要工作，有的被评为全国或省市的劳动模范，有的为了人民的利益献出了生命……他们在各条战线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贡献。一位学员回忆：同志们“乐观向上、斗志坚定、公而忘私、追求真理的高尚品质和革命精神，都是在建院这所革命熔炉中逐步形成的”。

1949年1月，淮海战役胜利结束。3月，经组织决定，建院师生全部南下，多数随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等参加进军大西南的战斗，部分人员参与接管南京工作。至此，建院完成了历史使命。

